

趙剛

## 猶抱琵琶半遮面的 「新興民族」\*

雖然看起來不過是另一本早已汗牛充棟的「發現台灣」式暢銷書，許信良著的《新興民族》(遠流1995)(以下簡稱「許著」)<sup>1</sup>和這幾年流行的台灣(泛)民族主義論述有重大不連續性：以台灣資本的利益為依歸，以布爾喬亞的現實主義政治(Bourgeois Real Politik)為「原則」，以重新設計過的「台灣人」、「民族」、「國家」等概念為武器，「許著」重大地挑戰了現行台灣民族主義的基本提法。在「許著」裡，「台灣人」即是台灣資本家(特別是中小企業主、台商)；「民族」或「國家」的目的即在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則是資本累積的工具。但或許由於形格勢禁，或許由於機會主義思考，「許著」所召喚的主體(事實上即布爾喬亞「新興階級」)在登台亮相時，必須猶抱「新興民族」的琵琶半遮面。雖然含糊不當地稱台灣這幾十年新興的大小資本家為「新興民族」，「許著」對於這個社會階級的利益的回護卻是毫不含糊、攻守有據。當資本撞到民族，「許著」明顯地和前者站在一起；資本所欲，常在許心。

「許著」是泛民進黨論述在九〇年代頭一次較認真地面對資本主義發展和民族主義政治之間的對立現象。歷史地看，民進黨在一九八六年成立以來，先後以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修辭調和資本與「民族」(或「人民」)的矛盾的企圖，在九〇年代初，隨著兩岸漸漸浮現的經濟相互依賴的現實，出現了一個重大難題：「台灣民族主義的政治計畫如何看待中國大陸的市場？」當然，這個難題所逼迫的對象不只是民進黨，更包括執政的國民黨，但兩黨典型的反應則不外乎一面迴避問題，一面把民族主義推向更道德化、更純粹化的境地，而其目的不外乎藉肯定「文化的自我」(即，台灣化或本土化)在「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的層次上和「中國」劃清界限。這是用認同政治取代或指導現實政治的作法。但當兩岸關係隨兩岸的認同政治的升高而趨不穩，最受直接威脅的是已經在兩岸經濟「共同體」之內的台灣資本。是在這個脈絡下，「許著」自比為台灣資本的喉舌，提出「大膽西進」，並申論國家在此經濟計畫中的角色。我認為，「許著」對於這一個問題的布爾喬亞現實主義政治立場已對其它主流政治意識型態構成了直接的挑戰。

因此，對這本書進行評論，是因為察覺到這個最新出現的「新興民族」論述在台灣當下的主流政治意識型態的光譜中佔有一特殊的位置。為了能更清楚的指出它的位置，並對其進行理解與批評，我必須先約略描繪近年來當道的兩種主流政治意識型態：前幾年民進黨內主流的族群民族主義，與最近國民黨與民進黨共同形成的的國家民族主義。

### 族群民族主義與族群衝突

伴隨著幾乎每年都舉行的全國選舉活動，台灣的族群民族主義論述在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急速升高。雖然台灣已是一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主流的福佬族群民族主義卻是非常地依賴農業的、鄉土的社會意象與象徵構築它的論述，而凡是這二、三十年裡台灣所逐漸形成中的資本主義分工、社會組織的分化、價值領域的多元化，則都被遺忘或刻意掩蓋起來了。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並批判這一有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指意之間的落差現象：

刻在台灣進行的民族主義論述在象徵層次上所集中表現的「台灣人」不就是以農夫為主要意象嗎？而工人卻在這個象徵建構中被遺忘了。真的是遺忘嗎？不盡然。所有極右傾向的民族主義建構都是依賴農夫、傳統、土地(soil或earth)、gemeinschaft、血緣、作物(例如稻米、蕃薯)、農夫用物(例如斗笠、水牛)為其標準符號。今天在極右民族主義運動中，「台灣人」作為一Volk，即是一建構的迷思，而「自然性」則是這個迷思的龍骨[……]。(趙剛1995:8)

這個時光倒錯的、高度同質性的「台灣人」意象的建構，是涵蓋在一個大的政治計畫之下的。這個計畫首先以浪漫的田園想像與「共同體」為觸媒，活化大眾心理中對於台灣的資本主義的病態的發展(例如，高度環境污染、各種社會領域的商品化、合法權威的缺乏)的高度反感，然後藉建構一個「想像出來的」(imagined；借用Benedict Anderson 的用法)的團結面與對立面，來移轉一般人民對其它種種的重要社會病態與矛盾的注意，進而把主要、甚至唯一矛盾界定在「鄉土」-「傳統」-「本省人」vs.「官僚」-「現狀」-「外省人」上。相對於這個較明顯可見的鬥爭形態，還有一個較後設層次的鬥爭，是環繞在與各種現代性論述(以及，後現代性論述)對台灣社會的理論定性，及其關連的運動策略之上。對於這些來自左右不同立場的(後)現代性論述所提出的問題(例如，階級衝突、國家相對於市民社會的角色與權限、公私領域的劃分、社區的消蝕、資本部門的重構、符號與資訊冗濫

下的社會與文化生活)，族群民族主義往往不是置之不顧，就是提出一種太過簡單以至於流於虛假的「超越」方式，例如，「只要我們這個民族能夠建立我們自己的(民族)國家，這些問題就能迎刃而解。」各種民族主義鬥爭並不僅僅指涉族群或民族的鬥爭，而更是關係整體社會形構層次的鬥爭。

族群民族主義一般說來有兩種相互強化的論述方式：一為本質論，二



為排除論。前者特別強調語言社區，由於使用者共享一由特殊語言所承載的「內在經驗」，所以成爲一共同體。這種本質論的民族界定不論在理論上或歷史上都站不住腳，而當它勉力搜索枯腸，找尋「民族」的證據時，又大多是透過霍布斯邦所謂的「回溯神話學」，先肯定民族的存在，然後再到歷史中建構或發明證據。排除論則是源自於本質論的貧困，它靠消極定義，即靠指出誰不屬於這個民族，來描出這個民族的界線。這種論述的現實後果當然可能有利於被召喚者的認同的形成，但代價則是「仇外心理」(包括境外的「敵人」與境內的「通敵者」)在社會心理層次上被強化，後果之一是社會的溝通被物化的

「(糟了，寫了一個性/別字)……」(犬馬攝)

分界所阻絕。台灣近年來每逢選舉來臨，整個論述的天空幾乎完全爲充斥族群民族主義(不管是「大台灣」，還是「大中國」)的烏雲所籠罩，族群間劍拔弩張，缺乏相互理解。最象徵性地表現了「族群衝突」的恐怕是眷村了，經常被描繪爲「落後」、「愚昧」、「反動」的外省人聚居處，需要被拆除、打散、與「融入」。

### 國家民族主義與文化工業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一、兩年裡，雖然族群民族主義的許多基本架構仍然存在，台灣的民族主義論述已產生了一微妙轉變：「外省人」從「台灣民族」的「他者」之一，轉變到「外省人也是台灣人」。在這個「四大族群融合」或「生命共同體」的提法下，「台灣民族」的「他者」則更聚焦到「對岸的中國人」了。因此，如果說過去的族群民族主義的談法是藉「不義的外省人——國民黨」的對立面動員「福佬人」，那麼現在的論述焦點則轉移到藉「可惡的中國人——共產黨」的對立面動員「台灣人」。因此，這個「族群融合」並

不是如表面所示的天真無邪，一個不分你我的和樂社會；因為不分你我，不是指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分你我，而只是指一致對外不分你我。因此，國民黨的「社區生命共同體」和民進黨的「四大族群融合」，在它們表面的形似多元文化論的「道德」光環下，所要達到的不過是在「社會內部」積極建立一由上而下的整合（例如透過「務實外交」、民意調查、文建會、與總統選舉）。這個內部整合表面上容忍異質性文化，但實質上則是對異質性施加「文化工業策略」——承認、包裝、吸納——來同質化異質性，以建立新的族國（nation-state）與新的國族（state-nation）。這整套作法及其論述即是我所說的「國家民族主義」。

拿前面提到的眷村為例，現在主流的（民進黨與國民黨皆然）提法已不再像過去一般，粗暴的要把眷村的竹籬笆拆掉，強迫它「融入」主流鋼筋水泥社會，而是以軟綿綿的文化工業策略來談論它。在文建會的社區重建計畫中，眷村也成為了「四大族群融合」的一個樣版社區。而在這個「文化工業部」（即，文建會）的文化整形外科手術下，眷村的異質性被同質化，特殊性將被普遍化。不同於過去粗暴的「拆掉竹籬笆」的提法，現在的關於「竹籬笆」的文化工業式的談法是：其實眷村住民很早很早以前就認同台灣了，因為他們選用的竹籬笆建材是台灣本土所特有的……云云。而主流媒體也無意中揭露了文建會所大力支援的「社區下鄉」的談法其實是國族（或「社會整體」）的打造：

針對逐漸消失的「竹籬笆」文化，由知識份子用科學方法、知識訓練協助整理虛根的文化體質，成為一有時代背景的人文生命體，幫助他們定位，建立自己的歷史，使眷村走出「鐵票」的政治部隊隊伍，帶著整理過後的新「身體」、「認知」、「信心」投入社會整體，不再自閉於竹籬笆狹窄的天地。（《聯合報》22-6-95, p.41）

這是一個同質化所有民衆身、心、靈的國族打造工程，它的最重要的鼓風爐則仍是一種仇他心理，甚至是更被強化了的一種，因為過去的「族群矛盾」已被轉化到「同仇敵愾」了；內部的零碎異質性現在都要被統合起來，一致對外了。高漲的仇他心理則可能在將來的危機時刻轉化為動員「全民」進行刻苦、服從、與戰爭的群眾心理基礎。當然，最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戰爭永遠不發生，而永遠可能馬上發生，而在這種「創造性的模糊」下，政治的首要工作即是控制鼓風爐的溫度，時而升溫、時而降溫，以百姓為芻狗。階級、性別、或族群的議題則在這個共同體的要塞國家（garrison state）中被重重壓制。所以，生命共同體、四大族群融合、千島湖和亞運

申辦過程中的「民氣」、文建會的「社區」重建、「務實外交」、和軍事演習都只是一個現象；而「發現台灣」和「保衛台灣」也只是一體兩面。台灣的危機已由「族群衝突」升級到「國際對抗」了，而民族主義的主要綱領也從以民進黨擔綱的族群民族主義「升級」到由國民黨「層峰」領銜主演、民進黨要員情僑客串的國家民族主義大合唱了。國民黨李政權，由於掌握國家機器之利，成功地接收了原先由民進黨所經營的族群民族主義情緒，並將之用於建立新的民族國家，而在這個民族主義的新階段中，民進黨只能扮演配角。

國家民族主義的整合所依據的是一民族（新的台灣人）認同政治，而非以批判的公共論述為基礎的民主參與。因此，這個整合雖然也拼命的講一些貌似進步的術語，例如，草根社區、「由下而上的動員」、多元文化、公民……等等，但是這些概念的果仁——民衆在生活的各領域中上當家作主——都被掏空了，剩下的只是認同政治的果殼：人們從各個社會的角落（即，「社區」）「由下而上」的「主動的」認同這個新秩序、新國家；只能認同，不能抗爭。而認同的邏輯是：認同它是因為我屬於它，我即是它，而它存在的合理化是因為它的對立是邪惡的、落後的，因而它自己必是道德的、進步的（這即是文建會的妒恨心理學ressentiment）。凡是進入到這個意識框架的人即是這個新的民族的一份子，而整個朝野戮力以赴的目標即是讓每一個台灣人都進入到這個意識結構，它的正極是自戀，負極是仇外，兩極相生相成。過去這半年中幾乎台灣社會中所有的文化再生產力量（甚至包括「左」的力量）都被捲進這個民族打造的工程，不管是擔任正極或負極的角色。

國家民族主義是一個由國家由上到下的以其普世性範疇編隊（regimentation）「疏離的市民社會」的論述行動，因而族群、性別，以及（特別是）階級的平等（equality）或差異（difference）的議題都被壓制了。這是莊子所說的「為大盜積」的工作；零散的珍寶當然不如裝了箱、上了鎖的珍寶更容易在「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因此，不管現在的兩黨或三黨的意識型態有何枝節差異，都不會真正反對這一個將人民裝箱（即「社區」、共同體）的工作<sup>2</sup>。這樣的國家民族主義，也是一種「管理的民族主義」，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馬庫色所謂的「被完全管理的社會」（totally administered society）。當然現實上目的與手段經常混淆，相較於浪漫的族群民族主義經常本身即是目的，國家民族主義似乎更只是一個手段；前者的國家權力是為了「民族情感」，後者的「民族情感」是為了國家權力。相對於族群民族主義的象徵核心是「鄉土地方」，國家民族主義的象徵核心是國家機

器(例如,「總統」與「文建會」)。前者的政治運動方式主要是民粹主義的,輔以國家主義的,後者則相反。由於兩者的意識結構的類似(仇外加自戀),以及其政治運動的互補性,現階段兩者之間不但沒有重大的意識型態上的緊張關係,反而有一定的相互理解與同情(所謂「李登輝的民進黨情結」,和「民進黨的李登輝情結」)。

族群民族主義可以不談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但國家民族主義除非和社會主義結合,就不能不談了;它必須幫資本的發展提供制度化基礎,和(或)找到海外出路。舊國民黨時期的國家支配,由於是以利益的分派(所謂地方派系)、強制力(警總情治)、和傳統封建習慣為基礎,無法應付九〇年代中後期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效率需要。「一盤散沙」(或「一袋馬鈴薯」)必須要被轉化為一塊電腦網路版。「公民國家」、「社區」、與「共同體」都指涉這個界線清楚的高效率整合體,既可以發展資本主義,也可以進行對外

戰爭。文建會的「社區重建」計畫即是要建立一個透過「社區」將國族建造、國家建造、和資本發展畢其功於一役,而這本質上即是葛蘭西所謂的霸權計畫:國家要以其哲學結合人民的習慣。用一文建會高層官員的話:「一個國家的資源要做合理分配,要有效



率地運用,就必須把傳統的觀念和作法顛倒過來,把主動性的角色轉換過來。」(陳其南1994)因而,「社區」也者,不外乎人民把自己組織起來,成塊的構成國家。如果說過去國民黨的「合法性」是屬於一種準封建性質的,靠的是政治上被動的大眾的因循服從的話,那麼現在超越黨派的新國家的合法性則是一種貌似超越封建的虛擬整合。這條路不是英、美等高度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自由主義民主制的路,而近似於德、日等國所走過的路。在歷史上,國家民族主義是能由上而下發展資本主義沒錯,但社會代價卻是空前的。此外,關於資本的海外出路問題,在台灣對中國大陸方興未艾的經濟依存關係下,國家民族主義(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的),都只有迴避這個當下現實問題,並規範性地提出南進「應該」取代西進。

國家民族主義雖然是反民主的,但並不排斥資本,而往往也以資本之考量為重。但是當國家權力的邏輯和資本的邏輯產生緊張或矛盾關係時,資本往往被要求委屈於國家權力的運作考量之下。這對於資本不利之處自

到別人的新書發表會,討論自己的出書計劃,既省去下午茶消費,又可多方接觸廠商、媒傳,真邪!(犬馬攝)

然是資本的累積處處受國家權力邏輯之掣肘，而無法建立完整的自主性與主導性。<sup>3</sup>民進黨總統提名候選人之一的彭明敏即堅持經濟應納在政治考量之下，反對三通，而和許信良針鋒相對。而和這個兩岸策略的態度聯繫在一塊兒的，則是彭明敏的以「中國」為負極的道德主義的認同政治：

這個「中國」因素好像一種強烈毒素，多年以來，侵蝕了台灣社會每一脈管，腐爛了政治、教育、文化、政策以及國民生活的每一部份。〔……〕國家目的破碎了，國民人格淪喪了，國民心理錯亂了，社會徬徨迷失了，人心焦慮不安了，價值觀念扭曲了，倫理道德頹敗了。〔……〕台灣民主能否落實推展，台灣人民能否生存發展，全繫於為政者和人民能否以理智和良知將「中國情結」徹底揚棄，完全認同台灣，不再分心，一致團結，全力建設新的社會、新的海洋文化。（彭明敏1994:6-7）

對於中共對台灣的可能的軍事反應，及其後果，彭明敏則強調『台灣人要有「自衛」決心，才是重點。』（《聯合報》7-9-1995, p.4）這個對於戰爭的決心的表示，近半年來更是屢屢見於民進黨高層的談論，以及李登輝的作為（例如演習）。而股市對於戰爭可能性的反應也頻頻遭到兩黨高層（李登輝與施明德）的批判。這個批判往往也是一種道德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例如，台灣人「有了物質，失去信心」（施明德語，見《聯合報》7-9-95, p.4）。可以感受得到的是兩黨都在無聲無息的展開一種目標是「明恥教戰」、「道德重整」的「新生活運動」。國家因此主要是一個文化機制，所宣稱的目的是使「民族」維繫其道德生活之純粹。這一個邏輯推展到極端則是納粹主義，領袖、國家、民族、人民成爲了鐵血交融之整體，而這個整體和「他者」的重要區別在於「精神文化」而非「物質文明」。國家民族主義因此只是一種整合層次更拉高、整合方式更細緻的族群民族主義，至於那帶著強烈的政治浪漫主義色彩的「自戀-排他」心理結構，則並無二致。

### 布爾喬亞現實主義政治與階級剝削

在這個新浮現的政黨間的國家民族主義的共識中，由於道德化的認同政治的高漲，因此凡是關於台灣日益加深的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以及在這個關係中具體的台灣資本家的利益等問題，都無法現實地討論。那些被台灣民族主義暗中視爲「通匪」、「資匪」，並一定程度上「蝕人心志」的台灣資本，可說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的照門。「許著」的重要意義即是在於它嘗試破解這個意識型態的照門。

「許著」的出發點是：中國大陸市場將是整個台灣資本主義發展之所

繫，不能不面對這個「已是不歸路」的「西進」(頁三三)。《新興民族》這本書就是明確地根據台灣資本的利益，現實地提出：如果許信良集團執政，將如何保障並發展台灣的資本的利益(特別是中小企業頁四一三)。所謂「新興民族」不過是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台商)所披的民粹主義或民族主義夜行衣罷了，用意不過是便於資本的利益在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的台灣社會能夠微服出擊罷了。所以，對「許著」而言，不同於國家民族主義，國家機器是資本累積的手段與條件，而非目的。「許著」的特點之一即是不再大量依賴族群民族主義的母數(例如，語言政治、生命共同體、妒恨心理)進行論述。「許著」的訴求對象只有台灣資本家，而非泛泛無所指的「台灣人」，它的政治計畫是台灣資本主義，而非台灣民族主義。要達到這個目的，「許著」得兩邊作戰：一方面攻擊對它而言仍是老舊封建、不能靈活反映資本需要的國民黨李政權(頁三三八)，另一方面攻擊民進黨內的民族主義虔敬派、或民粹主義教條派。

因此，簡單的說，「許著」是許信良及其同志在這個政治鬥爭中對台灣的布爾喬亞階級所提出的社會契約或執政企畫案，而這個企畫案的兩個最重要的基礎(而我認為在台灣的脈絡下是具布爾喬亞進步性的)，即是新的「台灣人」概念以及新的「國家」概念。

「許著」的「台灣人」不是一族群民族主義的概念，它不以血緣、語言、傳統等「歸屬判準」(criterion of ascription)來定義，也不是以靜態的心理狀態(例如，認同)做分類標準，而是以「成就判準」(criterion of achievement)(或「行動判準」)來定義。什麼是「台灣人」呢？「台灣人」不過是一群「知道得比別人多，活動力比別人強」(頁十七)的人：

我們都知道台灣人民如何從亞細亞的孤兒一躍而成日不落民族。從極南到極北，從極東到極西，地球的每一個角落大概都有來自台灣的商人、旅客或移民的蹤跡。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尋找一切機會，沒有國家的支持，只有國家的禁阻。當前往中國和蘇聯仍懸為厲禁的時候，他們已活躍於北京和莫斯科，甚至可以請警車開道，請「格別烏」(KGB)當保鏢。他們在聖保羅挨戶兜售，他們在紐約競奪市場，他們在深圳加工生產，他們在越南種植香蕉，他們在印尼砍伐木材……。而不管什麼行業，不管在哪裡，一旦他們有能力介入，別人就幾乎注定退出(頁十五)。

「台灣人」這個概念因此完全祛除了過去族群民族主義中「台灣人」的浪漫主義色彩；既不談「四百年史」，也不論二二八；既不講「台語之美」，也不提「南榕之死」。「許著」完全沒有棄兒的悲情，有的只是新富的自豪，捨



棄愛與死的救贖心理，奔向利與益的「經略」（許信良用語）行動。這個豪情四海，向大陸市場說「中國，我來了！」的台灣人形象當然是按照台裔的意象量身打造的。對所謂「知道的比別人多，活動力比別人強」的這個說法，「許著」的詮釋並沒有超越：「台灣人會到處做生意罷了」。對於這個新的「台灣人」的形象，我們當然可以很便宜地批評它，說它是充滿了布爾喬亞的非利斯汀、銅臭四溢。但是如果我們把它拿來和既存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提法比較的話，這個「台裔—台灣人」新形象有兩點進步性：1.它也許更接近現實，因為它是根據某一社會階級（的男性）的特殊的自我理解所打造的，有它誇張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經驗基礎；2.這個「台裔—台灣人」形象把族群民族主義中的「鄉土—台灣人」從回憶、妒恨、和信仰的救贖中抽離出來，而將它置於一能夠正當化的論述模式下（justifiable mode of discourse）。現在的這個「台灣人」具體有所指，不但是他的角色可以理性的被分析，也可以被理性的評價，因而代表這個「台灣人」的政治計畫也可以被質疑與討論。而過去的族群民族主義論述把「台灣人」不是擺在血緣、語言決定論上，就是意志決定論上（只要你認同這塊土地，你就是台灣人），那麼因此而生的政治計畫則脫離了理性論述的模式，而政治也虛矯的宣稱它是根據「道德」、「意志」、「向不可能挑戰」、「不可妥協的原則或目標」。

因此，「許著」值得肯定的是它一反過去台灣民族主義的談法，擺脫了悲情的自戀意識，代之以有經驗基礎的自我肯定意識。但更重要的是這個新的「台灣人」意識不具「仇外心裡」（即，仇中心理、仇共心理，或仇「外省人」心理）。而對對岸的中國人，「許著」的態度也是非常的「實際的」：

當我們懷著福山式歷史已經終結的高傲心態前去中國，或者懷著國民黨政權所說「制度之爭」那種自以為是的自滿心態前去中國，我們是與中國社會相隔的，我們不可能成功地與中國人作朋友、一起合作。如果這樣，不管表面怎麼樣，我們跟中國仍然是潛在對立的。這樣，我們絕不可能成功地經略中國市場。〔……〕我們會對中國歷史，特別是這半世紀以來的歷史，所形成之特殊的文化、制度、國情，乃至國民性，有特別的瞭解，並且給予充分的同情與尊重。我們不會追求純粹，也不會拒絕混和。只有這樣相互包容，這樣用對方的立場來思考，我們才能化潛在的對立為利益融合的一體；只有這樣把別人的利害當作自己的利害，我們才能共存，我們才能合作去經略中國廣大的市場。（頁三七〇、三七一）

這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來自於一個也很實際的分析：

我們之所以會認為與中國建立大量經濟合作關係是當前首要的戰略目

標，是因為中國市場是全世界最後且最大的一個市場，誰最能在這市場上掌握資源，誰就最能未來世界市場的競爭上有更大的優勢。(頁三五〇)

這個對中國的態度簡單的說即是：「我要同情的理解你，因為我要賺你的錢。」但縱然這是一個充滿著布爾喬亞策略性與工具性的對「他者」的態度，但比較起不同品牌的民族主義，「許著」的「台灣人」提法至少有一點是進步的：台灣人希望被他者承認，但也願意同樣的承認他者。這比很多有浪漫或民粹傾向的族群民族主義者一直在訴諸「台灣人」與他者的不可調和的「特殊性」是要進步的，更別提國民黨高層動輒指中國(或中共)為「土匪」、「大棵呆」、「小孩」、「沒有新文化」、或「水準不到」的談法，完全缺乏對「他者」進行理解的能力與意願，而被「自戀-仇外」情結所吞噬。

「許著」的「台灣人」除了擺脫了流行的「自戀-仇外」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結構之外，它對於「國家」角色的看法也和其它種類的台灣民族主義大有不同。對「許著」而言，國家是經濟鬥爭的場域，而「許著」即是許信良集團向台灣的資本家表態：他若執政，台灣的國家將成為資本的忠心僕歐。對「許著」而言，國家並沒有國家民族主義或族群民族主義裡頭的有機整體主義信念；國家不是目的，整體也非自由，國家更不是一文化的、美學的具現；民族也不是一文化有機體。國家打的不是文化戰，而是經濟戰與政治戰。這個經濟政治戰外邊打的是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裡邊打的是階級鬥爭。前者不勞我們費心，我們倒是要注意「許著」如何在國內進行階級戰爭。

這個階級鬥爭的主要綱領是由國家為資本家提供最有利資本累積條件，大開方便資本家之門，而這即是「許著」〈結論〉的焦點。舉一個有代表性的例子，「許著」認為，企業不必投資於它自己的研究發展，國家可以當企業的研發總管，幫企業出錢出力：

台灣經驗將會證明，未來的科技研發畢竟還是要回歸到公共部門來，由國家、而非企業來推動。國家出資獲得的研究結果，當然是向大眾開放的公共智慧財。(頁四一一)

因此，「許著」的國家不只是資本家的「管理委員會」，也是「研發委員會」。但所謂研發工作和成本由國家負擔，不過是由全體納稅者(所謂「國家出資」)來幫資本家階級賺錢的另一種說法罷了。但「許著」在慷他人之慨後，還要剝他人之皮。「許著」不但要台灣的廣大受薪階級出錢幫資本家研發，還要剝奪他們所可能享受到的社會福利。「許著」所要追求的是連歐美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都無法達到的反社會福利政策，而理由是：

在西歐、美國，他們吸納社會主義理念的方式基本上是用社會救濟、福利金發放為主體，然而將近一世紀的實施下來，卻造成社會老化、遲滯的現象。一個關鍵點就在失業、無業在社會救濟系統下成為常態。社會救濟澆熄了一般人民活動、勞動、創作的本能熱情。〔……〕國家施政應該盡可能達到充分就業的目標，讓所有人都能伸張其工作權。國家、政府救濟的功能不再是著眼於金錢補貼的發放，而是更積極主動地負起協助大眾就業的責任。（頁四二〇、四二一）

否定社會福利倒是否定得乾乾淨淨，但是如何幫助一般大眾「伸張其工作權」卻完全閉口不提。對於如何把現在和將來的「外勞政策」和它的「伸張工作權」調和，這一個無法迴避的迫切問題，也完全三緘其口。相對於「許著」呵護資本利益的懇懇切切，它對於工人階級或一般受薪階級的淡漠虛矯就更加明確了。例如，當「許著」得面對勞動力再生產的問題的時候，主意就打到「工作倫理」和「家庭」上頭來了。它認為台灣的資本主義的未來走向有「兩項彌足珍貴的特質可堪動用」：1.工作態度；2.家庭組織。關於第一點，「許著」認為「台灣絕大部份的人還是把工作視為是一種生命的積極意義，甚至是一種義務」（頁四二一）。這可能適用於「台商」或其他肉食者，但絕不是絕大多數的「台工」對高污染、高剝削的工作環境和條件的態度。<sup>4</sup>而關於「家庭組織」的提法，更暴露出「許著」所謂的國家要「負起協助大眾就業的責任」已暗渡陳倉地由家庭負起責任來了。「許著」的國家因此將勞動力再生產的任務也丟給個人與其它傳統社會制度了。

在「許著」的策畫中，資本家不但要白吃國家免費提供的「研發」午餐，還要馬兒不吃草窮跑（工人的「生命的積極意義」！）。但還不止於此，「許著」還要國家幫資本家掃垃圾——負擔資本主義生產對環境的破壞責任。「許著」的最後一頁提出了台灣的環境危機問題，雖然它也認為「台灣在環保方面不但不能鬆懈，還要更加快腳步迎頭趕上」（頁四二四）但是，誰該負責呢？「許著」的答案仍是驚人的（但在台灣，也是令人尊敬的）、吾道一以貫之階級立場，幫產業、企業的環保責任給輕鬆卸掉了。這個環保任務：

不能再像西方國家那樣由民間團體零散出擊、各自為政，而是必須由政府出面扛起這個責任，統籌善用各種資源，儘速還我福爾摩沙原有的山林美麗面貌。」（頁四二四）

因此，所謂「新興民族」其實就是雖然利火薰心但仍欲語還羞、欲蓋彌彰的台灣的資本家階級（特別是中小企業主、台商），亟欲追求他們的清楚的階級利益，但仍然媚俗地將自己拖附在民族主義的詞彙偽裝下。「許著」

即是一政治集團試圖代表並言詮(articulate)這個階級利益的一個嘗試。「許著」的布爾喬亞意識雖然把整個現代社會漆成鈔票色，根本無法敏覺現代性的各種疏離、異化、宰制與剝削問題。但是，相對於族群民族主義對於現代性的虛偽整合的反動性策略(關於對這一點的批判，請參考趙剛1995)，以及因其而來的各種政治美學化、非理性政治、仇外政治、道德主義、領袖崇拜……，「許著」無疑是一較具進步性的論述，因為它至少把政治從「民族文化的」、「道德的」、「信念的」、與「意志的」鬥爭中，解放到一階級的、經濟的、政策的、現實的、與論述的領域中。這是「許著」的「大利與大益」(the Utility and the Interest)對「鄭南榕式」的「大愛與大死」(the Love and the Death)，資本對「鄉土」，「台北」對「宜蘭」、資本主義對民族主義，美學的政治化對政治的美學化。這樣子被解讀的「許著」因此有可能幫助(不管是有意或無意地)把混沌的、美學化的、民粹的、準法西斯的、「共同體」的台灣的文化、政治、與社會推向一個可能在制度與價值領域上越來越明顯區分化的情況，而有利於階級、婦女、和族群運動的開展。從工人運動的觀點看，一個清晰的、大開大闢的布爾喬亞階級動員面的建立，將會對工人形成一較以往清楚的對立面的刺激，撥雲霧而見大山，或許有助於台灣工人形成階級意識。從民主政治的觀點看，「許著」有可能幫助開展另一種政治鬥爭的空間，把政治變成一個(至少理論上)可以經驗評價的活動，因而有公共責任歸屬(public accountability)的性質。總而言之，相對於上述兩種民族主義，「許著」的提法有不可輕忽的進步性。如果純就理論邏輯來看，台灣的「自由主義者」應該是會積極地支持許信良式的說法的。

從社運的觀點，傳統的民進黨內的族群民族主義勢力，以及刻在國民黨與民進黨都在發展中的國家民族主義勢力，和「許著」所代表的力量之間的互動消長值得我們注意。<sup>5</sup>也許，「許著」所代表的現實政客的現實主義政治無法為具有「讀書人」、浪漫文人、宗教家與道德家氣質的的族群民族主義或國家民族主義人士所容忍，而被打壓<sup>6</sup>；也許，「許著」鮮明的階級立場竟能幫民進黨從情感超載的象徵政治冷卻下來，開始進行現實主義政治，作為執政黨仇外症的國家主義的制衡，而成為真正的反對黨；也許，「許著」的這一種現實的談法只是一個「現實上」窒礙難通的策略(那麼台灣的現實竟是反現實的!)，在現有的「意識型態-權力」機制下，這個「許著」所代表的權力集團到時候還是得被捲進認同政治的漩渦。那麼，用《新興民族》這麼一個媚俗的書名或許就是為了預留伏筆，保留將來階級政治沒出路，再

掉頭回到民族主義政治航線，因而不得不機會主義地「猶抱琵琶半遮面」。

最後，我不得不說，這些「也許」所預設的是一個兩岸關係現狀持續維持的一個常數前提，但是自從今年五月起（或許遠自千島湖事件起），兩岸關係已不再是一個常數了，而這些「也許」也許竟沒有時間讓它們展現為現實呢！

\*編按：本文副題「從許信良的新書看台灣民族主義論述的轉變」因版面關係在此略去，目錄中則保留。

#### 註釋

1. 這本書是一集體創作，其它參與者為「陳芳明、陳忠信、楊照等五、六人」（《中國時報》4-6-1995, p.43）。這本書事實上是許信良競選總統的第一波文宣，接下來還有《挑戰李登輝》、《許信良傳》等書。
2. 新黨由於其一貫鮮明的「反共」立場，很可能也將被收編入這個共同體中。
3. 當然，這不是完全不利於資本的，因為資本家階級在「國家民族主義」掛帥的國家之下，因為被認作屬於「全民」或「共同體」的一有機組成部份，得以匿名的方式運作，而迴避了與勞動的直接衝突。
4. 要不然台灣工人的流動率為何高居不下？既沒有強大的工人的組織連結，也沒有社會福利，台灣工人只有以不斷的更換工作為手段（當然是一不甚有效的方式），逃避惡劣的工作條件。這個個體化的「離職作為抗議」（exit as protest）自然無法被戴著布爾喬亞眼鏡的「許著」看得到。
5. 在這個將來可能出現的派系拉扯和分裂中，民進黨內一向標舉「工人階級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並存，且和「新潮流」關係密切的「勞工陣線」的動向，也就格外地令人感到興趣了。「勞工陣線」是要歸於民族（粹）主義呢？還是歸於經濟自由主義呢？或是自組一「階級政黨」呢？據媒體報導，吳乃仁（「新潮流」系的一重要角色）已正式為許信良的競選總部擔綱跨刀了。
6. 《中國時報》的〈開卷版〉的一篇署名吳叡人的明顯的來自泛民進黨同志的書評（4-6-1995, p. 43），對「許著」進行明褒實貶的嚴厲批判，指它為「樂觀者的建國神話」。主要的批判點是：「許著」對台灣『最重要的內部矛盾——國家認同分裂，與因之衍生的省籍對立，都隻字未提，就宣告台灣住民已經形成一個「民族』』。評論者因此擔心假如島內不先把民族認同的問題解決掉，『誰又能保證，台灣人這個假想存在的「新興民族」，不會在「經略」中國過程中，被商業利潤消納於龐大的中華民族之中呢？』這很清楚的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對於「許著」的布爾喬亞現實主義政治的反彈。

#### 參考書目

- 陳其南 1994 〈社區與國家重建〉《中國時報》（日期版面不明）。
- 彭明敏 1994 《回顧與展望》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叢書。
- 趙剛 1995 〈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即將發表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